

十年前，在“文化大革命”这场悲剧性的历史灾难中苦苦磨难了十年之久的周恩来，在耗尽了最后的一丝精力之后，与世长辞了。这一悲壮的死，使得遭受了太多磨难的人民仿佛一下子成熟并又觉醒来了。在悼念周恩来的旗帜下，人民心底酝酿已久的爱与憎像火山一样喷发出来。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声势浩大的以天安门事件为中心的反对“四人帮”拥护邓小平为代表的党的正确领导的四五运动，从而导致了“文化大革命”发动以后就已存在在中国社会内部的深刻的政治危机的总爆发。仅仅半年后，党中央便代表人民的意志，粉碎了江青反党集团，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历史灾难。这一切，是反映全党、民心向背的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与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忍辱负重、砥柱中流、力撑危局，呕心沥血地减少“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损失并且因此而赢得广大人民群众的理解和衷心爱戴这一点分不开的。

（一）

1966年“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国之时，周恩来已近古稀之年。他是在党和国家遭受严重危难这样一种历史曲折中，艰难而顽强地走完自己生命历程中最后十年的。

由于复杂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包括周恩来在内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在自五十年代后期以来党的指导思想上的“左”倾错误不断积累并且急剧发展的过程中，尽管作出了种种努力，但最终并没有能够阻止“文化大革命”这场历史灾难的发生，而是不得不在一种无论理论还是实践都不具备充分认识而而战胜“左”倾错误的条件下，接受了“文化大革命”这一痛苦的既成事实。

艰难而光辉的最后岁月

——记“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周恩来

高文谦

对于这场来势凶猛的“文化大革命”，周恩来如同其他党中央领导同志一样，思想上是缺乏充分准备的。他是在正风仆仆地忙于推动北方八省区抗旱和领导邢台抗震救灾的紧张工作时，被卷入这场政治风暴中心的。对于这种自上而下的地鼓动、纵容群众起来“造反”，有意造成“天下大乱”的作法，周恩来是很不理解的。用他自己日后曾在不同场合讲过一次地讲过的话说是，“连做梦也没有想到”。如1966年10月中央工作会议期间，他就在一次讲话中用“方兴未艾，欲罢不能”来概括运动的形势，并且百感交集地说：“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么大的局面”，“这首先一想就不寒而栗”。甚至在两年之后，1968年9月，他在接见美国工人、解放军宣传队时还表示，在同志们面前，应该说老实话，我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初期也是很理解的，没想到到今天这样的局面。

当然，周恩来对“文化大革命”的理解和认识，不能不受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在“文化大革命”这一历史过程的本

质尚未充分暴露，并且被罩有种种神圣而虚幻的光环的情况下，周恩来如同绝大多数人一样，在一开始怀着真诚的愿望，努力从好的前途去理解“文化大革命”，希望通过它能够真正驱除和消除党和国家肌体上确实存在的某些弊端和阴暗面，以保证党和国家不改颜色。基于这种理解，他认为在无产阶级已经执政的条件下，这样的革命，只有在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的领导下，采取有组织有步骤的方式，在尽可能地不影响社会正常生活秩序的前提下，沿着健康的轨道发展，才能达到上述目的。

但是，这一想法，同“文化大革命”所谓通过“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设想，同后来运动的实际发展，相去甚远。这种思想与现实的尖锐冲突，不能不使得周恩来陷入一种极大的困境之中。因此，在“文化大革命”发动以后举行的一系列重大会议上，周恩来总是只能检讨自己的思想“跟不上”，“犯”错误”。如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他就检查了自己总是“按照旧有的办法，旧脑筋对待新革命、新运动”，并表示要以“一种热情投身到战斗中去。投身到战斗中免不了犯错误，大的小的，

我就犯过大的错误，现在问过这个事情一定也要犯错误，要做这个精神准备”。又如，他在同年十月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正式发言中说：十一中全会以后，我努力紧跟毛主席，但“有时仍有掉队之虞”，但我要有一个信心和认识，过必改，努力赶上。

尽管周恩来努力从主观上查找原因，但是，他不能不视觉和国家陷入动乱和分裂之中的严峻现实。这种无法排除的内心矛盾，在整个

“文化大革命”期间始终缠绕着他，从而使他被迫以一种无言的痛苦和忧虑之中。不难想象，当他眼前透进着自己心爱的十七年来社会主义祖国建设的成果有可能在这场“革命”名义下的动乱中毁于一旦的时候，他怎么能够无动于衷，又怎么能够“努力赶上”呢？这种心情使得他有时不得不以曲折的方式表露出来。如1966年12月，他在接见中国科学院的干部和群众代表时，就说过这样的话：因为思想不能如同领袖的预见和魄力，对“文化大革命”的远景和目的是很不理解，所以很不得力，很不认真。有时是不自觉的，总想分个步骤，有个次序，但实际总行不通。又如，他在1967年初接见财贸口干部的谈话中，回顾了自“文化大革命”发动以来，所进行的规模数次冲破了自己原有的思想后，几乎不加掩饰地说：“这就是我们在运动中紧跟毛主席的思想，紧张、紧张、紧张，还赶不上。”这一段话，正是周恩来当时心境的真实写照，生动地反映了他对“文化大革命”努力想加以理解而又感到无法理解的内心矛盾。

（下转第五版）

发扬拥政爱民优良传统

解放军去年一年抢险救灾成绩显著

本报讯 人民解放军1985年积极参加抢险救灾，取得显著成绩。据总政治部报告，去年全军共参加抢险救灾三千二百多次，出动二十七万余人、飞机、舰艇二千三百多架（艘）次，车辆、机械一万五千多台次，抢救遇险群众十万余人，抢救各种物资三万八千多吨。

去年是我国灾情较多的一年。许多部队主动与有关部门、单位联系，做到一有情况，立即出动。去年8月23日深夜，新疆乌恰县发生七点四级强烈地震，震区房屋倒塌，道路断裂，断水断电。新疆军区闻讯连夜派出部队、车辆和医务人员，冒着余震，连夜赶赴大雨肆虐灾区。两天多时间，指战员们运救伤员三百三十多人，安全转移受灾群众万余人，抢救粮食一百八十多万斤，各种物资五百多吨。指战员们还为群众修复了水渠、水井，并搭起大批防震棚，使灾区群众很快恢复正常的生活。

东北地区发生特大洪水灾害后，沈阳军区党委派出六万多名指战员奔赴辽河两岸，加固堤岸，抢救受灾物资，保护受灾群众。在抗洪抢险的日日夜夜中，许多干部战士几十小时不吃一粒粮，没喝一口水，连续奋战，有的献出了宝贵的生命。经过两个多月的努力，指战员们共修加固堤坝十六万四千多米，维修铁路、公路十八万多人，修复桥梁、涵洞一百二十多座，抢救、转移受灾群众五十多万人，抢救物资一万三千多吨。

（张秋良 胡年秋）

服从需要顾大局 愿为高原作贡献

青海三百多名文武干部自愿留在原地

新华社西宁1月4日电（通讯员赵进、王洁）不恋家乡风光好，愿把终生献高原。青海省军区三百多名文武干部在刚刚整编中服从国家建设大局的需要，自愿扎根高原，为开发建设青海作出贡献。

青海省军区四十二个县、市武装部中，有一个在海拔三千多米的雪山山腰上，高寒缺氧，条件艰苦。中央决定县、市文武干部划归地方建制后，不少干部怕高原地方建“飞骑牌”变成“永久牌”，在高原、草地干一辈子累垮身子；有的担心夫妻长期分居苦了妻子、影响了孩子等。联系上思想，省军区各级党委把精简编组、同热爱青海高原、学习英雄模范活动结合起来，帮助文武干部树立以四海为家的思想和自我牺牲的精神，自觉服从中央的全国一盘棋，收到了较好的效果。全区有三百多名文武干部要求留在青海高原工作。绝大多数文武干部做到了心不贪，劲不松，工作井然有序。海北军分区宣武、樊奇义、刘云祥、段虎来等六名干部，是从河北、

龙州县委坚决纠正不正之风

本报讯 据广西日报报道：广西龙州县委领导成员在纠正不正之风中，既严格要求自己，又敢抓敢管，有效地带动了党风和民风的好转，促进了工作的开展。

过去，这个县的不正之风比较严重，尤其是在1984年一段时间内，有的党政机关干部和县属单位干部，有的乱发钱物，有的甚至进行贿受贿，私分公款。县中有十五个大小案要案。群众对此意见很大。面对这一实际，县委态度鲜明，毫不手软，先后从县的四大班子中抽出五十名领导和二十八个办案人员，认真查处。县电局的有关人员，在组织内都承包安装龙州至金兰三十五伏变电站线路工程中，借改革之机，将不属于节余的五万九千元工程费当作节余款全部分掉。去年一月，县里进行了查处，有关人员不服，多次上访。上级有关部门的个别领导也出来说情。但是，县委毫不动摇，排除干扰，终于在去年11月初，查清了这个案件，严肃处理了有关人员，追回了被私分的全部款项。现在，全县的十五个大小案要案，十二个已经结案，依法进行了处理，三个正在查处。去年以来全县乱发的钱及实物折价三十三万八千多元，已收回十万零七千多元。

龙州县委在纠正不正之风中能敢抓敢管，关键在于县委“一班人”过得硬。县委书记兰祥美自1981年到这个县担任领导以来，不搞歪门邪道，为“一班人”带了个好头。

为了增强县委“一班人”的抵抗力，自1984年6月县委新班子建立以后，他们坚持做到每个月进行一次政治学习，每季度进行一次民主生活会。对个别领导成员出现的不正之风，在进行个别谈话的基础上，县委内部坚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特殊犯人”

江苏省丹阳县新桥乡一些党员干部对一个经济犯罪分子，在服刑期间探监慰问，刑满释放时车接回，礼别，设宴“庆贺”，并把他看作“能人”互相攀聊。这是起违背原则、蔑视社会主义法制、干扰打击经济犯罪分子的严重行为。

发展经济，需要提拔大批善于经营的人才，但他们必须是一心一意干社会主义四化、真心实意为人民谋利益的干部，而决不应依靠搞歪门邪道、甚至是违法乱纪的人。用后一种人，只能破坏改革和经济建设。新桥乡一些同志的所作所为，是“一切向钱看”的思想在用人问题上的反映，是缺乏理想和违犯纪律的行为，应当引起严重注意。

1982年5月14日，江苏省丹阳县新桥乡乡办客车厂原副厂长耿水林，因收受贿赂和贪污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由于在服刑服刑期间和刑满出狱前受到当地一些干部的特殊关心、照顾、青睐，所以当地群众称耿水林为“特殊犯人”。

在服刑期间劳改期间，新桥乡前任驻监“慰问”的有三十多人，其中党员、干部十八人。监狱时送来的物品有烧鸡、螃蟹、桂圆、密枣、麦乳精等高级食品。前去送礼、进贡的新桥乡客车厂、新桥村、围江村等五个单位。其中围江村

先后去过八次。这些单位探监慰问，都得到原乡党委书记魏芳林的同意或默许。她探监的同志转告耿：“不要想到东想到西，回来工作由党委安排。”

1985年5月12日，由乡工业公司安排，客车厂派中吉普，围江村派一名支委，专程到监狱接耿回新桥。

耿水林在监狱时就准备回家后办酒



中共山东昌乐县委在整章中，清查盗购小汽车的歪风，将其中一些单位利用截留利税和向下摊派等不正手段购买的二十一部小汽车全部收缴，由县政府酌情分配给有关部门使用，图为有关人员正在收缴小汽车。

新华社记者 王选连摄

天山南北涌现出两千四百多个军民共建点

新华社乌鲁木齐1月3日电（通讯员张驰、记者苏新发）至1985年，天山南北已涌现出两千四百多个军民共建点，两个“文明”的单位。

军民共建活动，促进了边疆安定团结和繁荣兴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顾问委员会主任吴信泉说：部队的功绩，新疆各族人民是不会忘记的。

军民共建活动中，指战员们以各种形式对青少年进行思想工作，转变社会风气。乌鲁木齐陆军学校的一百三十多名少数民族学生，在团地方院校学生开展共建活动中，帮助他们进一步了解民族的民族政策和全国各民族兄弟民族对新疆四化建设的支援，使学生感到祖国的温暖。

过去的一年，是新疆军区部队支援地方经济建设规模最大、项目最多的一年，先后上马八十多项。部队参加建设的北疆铁路工程、吐鲁番防化工程等大型建设项目，达到优质高速。在发生地震、洪水、风雪等自然灾害时，许多部队主动派出人员、车辆参加抢险救灾。陆军某师在一个多月的时间内，先后四次抢险救灾。

在最近召开的第二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期间，代表们在议论如何适应新时期的特点开展调解工作时，湖北省松滋县街市市区曙光村调解委员会主任秦开炎谈的体会，引起人们的兴趣。

秦老今年五十六岁，先后担任过公社副社长和大队党支部书记。1979年春，他见村民事纠纷多，常常因此影响生产，就主动要求担任村调解主任。六年来，他干边摸索，调处各类纠纷三百八十多起，还总结出三条经验：

认识纠纷的新特点。农村实行责任制后，过去比较突出的干部纠纷，现在不突出了。但邻里之间争田、争水权、争牛马等矛盾大增；家庭纠纷中，儿女赡养老人、夫妻间因安排生产和生活产生的矛盾比较突出。秦老分析了这些特点，又进一步提出其中的规律。一是有较强的季节性，一到春耕、秋收、冬种时，争水、争农机具等矛盾就突出；二是有明显的层次性，富裕的农户，为花钱置业引起纠纷，贫困户的农户则因一方不善经营而产生矛盾。对此，应如何解决呢？

探索调解的新途径。村里经商专业户增多，对小孩来买东西，喜欢克扣斤两多收钱，群众对此意见很大。秦老教育他要遵守守法，本分致富，使他认识到改正了错误，避免了一起群众出于义愤要去砸店的纠纷。秦老和村党委也积极开展法制宣传，对村里易闹纠纷的重点户、重点人和重点事，早打“预防针”，尽量预防和减少纠纷。他把这叫做强“重点预防”。农民吴明一家经营木材加工致富，秦老舍不得花钱，儿子却买回一台电视机，父子俩为此吵起来。秦老先批评儿子花钱不与父亲商量的错误，又给吴明讲解要增长财富，知识也要增加的道理，父子二人终于心平气和。他还在春耕前，帮村里制订水渠管理和耕牛、农机具使用制度，在丰收前，宣传不要铺张浪费，“提倡有计划的消费”。秦老说，这叫加强“季节预防”。去年4月，有十六户农户因共用一条水产生矛盾，他逐户访问，

黄国用

不在位的将军

点教育作用。莫文晔是百色起义的参加者。他撰写《百色风暴》一书，1984年12月，为描写虚弱的病体，亲赴广西参加百色起义五十周年的纪念活动，搜集有关资料。去年1月，他开始了写作工作，不顾年老体弱，日夜奋战，仅用了半年时间，就完成了二十多万字的写作任务，交辽宁出版社出版。胡耀邦同志为此书题写了序言，称赞“出版《百色风暴》这样的回忆录，是很有意义的。”

（三）

原装甲兵司令员黄新廷，虽然身着便装，但不失军人的威严。七十多岁高龄，走路铮铮有声，说话干脆利落。记者刚说明来意，他马上就说：“我的晚年就是写好《贺龙传》。这是我心中的一桩大事。”

黄新廷与贺龙有一种特殊的感情，这不仅因为贺龙同志是位功勋卓著的元帅，值得尊敬和爱戴，而且是因为在黄新廷五十多年的戎马生涯中，和贺龙有着密切的关系。黄新廷少年时，就在洪湖参加了贺龙率领的革命队伍，因英勇善战，长征前后就担任了团政委职务。在革命战争的岁月里，不论是挺进冀南、转战晋北、晋南，还是保卫延安、转战陕北，贺龙既是他的上级领导，又是他的同事、战友。他们同甘共苦，共患难，在战斗中结下了深厚友情。正是这个原因，黄新廷曾经数次因贺龙问题受到株连，差点掉了脑袋。一次是1936年，当时批判“军阀主义”，其目的是想整垮贺龙，但树大根深，撼不倒。于是，当时在贺龙手下担任团长的黄新廷，则成了“替罪羊”，受到了严厉的批判。再一次是十年浩劫。在贺龙被打成了“反革命分子”的同时，把担任成都军区司令员的黄新廷押解到北京，关押、批斗六七年，被妻毒打至致。

《贺龙传》工程浩大，任务繁重。按照要求写四五十万字，初稿一万多字得写下来。黄新廷是贺龙传记组的副组长，负责全面工作，从搜集资料到审定定稿，他都要参与。为了写好贺龙传记，去年5月，他带领传记组的同志，亲赴云南。他们从昆明出发，沿滇黔二方面军长征的路线，一直走到金沙江畔的石鼓镇，沿途访问老前辈，搜集资料，察看地形，进行实地考察。黄中曾在贺龙率一二〇师抗击日寇的战场，贺龙曾在那里负过伤，留下过不少战斗的足迹。先后又访问了黄新廷又带领随军同志去那里，先后走访了四五五个村，搜集了贺龙不少感人的事迹。

黄新廷感慨地对记者说，贺老总死得冤枉啊！我作为他的同事和战友，有责任有义务把他的事迹整理出来，以教育后代，告慰贺老总的在天之灵。

研究新特点 探索新途径

——记松滋县街市市区曙光村调解主任秦开炎

他说，这类问题就要坚持过细调解。

及时捕捉纠纷的新方法。从1983年冬开始，秦老在村里建立了纠纷信息网络，每个村民小组设一个信息联络点，指定三四名信息员，建立联络制度，保证准确传递纠纷信息，及时解决纠纷。去年12月19日晚，四组的的信息员找到秦老，说张家好象在闹矛盾。他放下碗筷赶到张家，才知道是丈夫打了妻子，妻子又打了婆婆。他遂下与父交谈，一直是深夜十二点，便到纠纷当天便得调解。近一年多来他调解的三十多起纠纷，有95%是信息员提供的。

秦老的体会受到与会者的赞扬，人们说，他是抓住了新时期人民调解工作的主要特征。

马在新

中国法学会召开省市区法学会负责人会议

本报讯 中国法学会1月4日在北京召开各省、市、自治区法学会负责人座谈会，交流1985年学会的工作情况和经验，讨论并安排今年法学研究工作计划和普及法律常识工作。

这是该会第二次召开这样的工作会议，中国法学会名誉会长张友渔、会长王仲芳等到会并讲了话。会议将于6日结束。

缅甸驻华大使举行招待会庆祝独立日

新华社北京1月4日电 缅甸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驻中国大使拉瑞南和夫人今天中午在大使馆举行招待会，庆祝缅甸独立三十周年。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黄华、纺织工业部副部长吴文英和各国驻华使节出席了招待会。

(上接第四版)

在随着时间的推展,“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灾难性后果越来越清楚地显现出来以后,摆在周恩来面前的可以有两种选择:一是远事避祸,洁身自好;一是坚守自己的岗位,与党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尽己所能来挽救危局。如果从个人的角度来看,前者不失为一条上策,后者则如履薄冰,前途莫测。但是,从青少年时代起就矢志报国,在窑洞群书中探索救国真理,最后认定只有共产主义才能挽救国家危亡的周恩来,在党和国家遭受严重危险的关头,又怎么会考虑个人的安危荣辱呢?周恩来毅然选择了后者。只要他能挽救国家从“文化大革命”这场看来难以避免的灾难中拯救出来,即使自己赴汤蹈火,出生入死,也在所不辞。1966年12月,他在与孙海山谈了几十年的老战友李富春的一次交谈中,倾吐了内心深处的这一信念:我不人虎穴,谁入虎穴?我不入地獄,谁入地獄?这正是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忍辱负重,苦撑危局的内心动力所在。

这里应当指出,周恩来苦撑危局所作的努力,有许多是得到毛泽东支持的。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希望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来揭露我们的黑暗面”,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因此,他并不希望局势动乱失去控制的地步,因为这并不符合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本意。在监察到林彪、江青等人总是竭力把自己的想法推向极端,唯恐天下不乱的情况下,毛泽东认为只有依靠和支持周恩来,才能稳定局势,维持整个国家生活的继续运转。为此,他曾几次出面干预制止林彪、江青等人阴谋陷害进而打倒周恩来的企图,并且在稳定局势、不能放松生产、对一些老干部的保护等问题上,支持周恩来的工作。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从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周恩来被指定主持中央政治局的日常工作的,担负起处理党、政、军日常事务的重担。这意味着要在“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中,保证七亿七千万的农、食、衣、住,以及为保证这一点而必须维持的整个国家生活的正常进行。这是一个极其难以协调而在当时的条件下又必须协调起来的矛盾。必须找到一种尽可能地使二者协调起来的途径。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周恩来以其对党和人民的全部忠诚、智慧和特有的方式,挑起了这副历史的重担。在越来越清楚地看到“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损失后,他取心沥血,殚尽全才,在尽量减少这种损失、维持国家生活继续运转的同时,等待历史的转机 and 人民群众觉醒的普遍程度。他曾多次说过并且为人所熟知的“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只有八个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便是这一心境的表露。在历史的悲剧面前,他还能再说什么呢?这正是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良苦用心所在,也是我们理解“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周恩来关键所在。周恩来以自己生命历程中最后十年的行动实践了这一诺言。

(二)

在探索了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动乱的年代里沉重而坚强的内心世界之后,我们应该进而考察他在此期间的作用。关于这一点,陈云同志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没有周恩来同志,文化大革命的后果不堪设想。”这是对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所起作用的肯定评价。这一重大的历史作用,概括起来,可以分为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起到了减少损失和中和错误的作用。小平同志在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问时曾经指出了这一点。即“文化大革命”的悲剧性,周恩来虽然费尽心思试图把党和国家从这场动乱中拯救出来,但在当时那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个人并无回天之力。然而,正像一篇悼念他的文章标题《大树参天护华荫》所形容的那样,当“文化大革命”的风暴铺天盖地席卷而来的时候,周恩来以自己的身躯,挺身抗击,力挽狂澜,在他掌握那一部分权力的范围内,尽可能地稳定局势,消除国家各方面生活的正常运转,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阻挡并减缓了这场历史灾难的打击,保护了党和人民。

如在八届十一中全会讨论“文化大革命”的行动纲领《十六条》的过程中,周恩来与陶铸商量后,删掉了原稿中“黑帮”、“黑线”之类的提法,同时加入了一些限制性的政策规定,如:“严格分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干部队伍要区别对待,好的和比较好的是大多数,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要文斗不要武斗;不要把运动与生产对立起来;保护科技人员;等等。应当承认,由于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是根本错误的,因而这些具体的政策规定不可能对“文化大革命”的实际发展产生重大的约束力。但是,尽管如此,这些政策性规定一旦在党的文件上得到确认,就成为周恩来日后为尽量减少



1975年1月13日,周恩来总理在四届人大第一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杜修贤 摄

艰难而光辉的最后岁月

“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损失、教育、说服群众摆脱极左狂热,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倒行逆施进行斗争的可行的武器。

在夺权问题上,周恩来为了尽可能地减少由此而带来的对各方面工作的影响,维持社会秩序的稳定,煞费苦心地对此作了种种限制。从夺权一开始,他就在各种场合一再重申,外交、国防、公安、财政、宣传、国内工业等权力属于中央,不能夺。并且进而规定:部机关夺权是夺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对业务工作只有监督权。随后,又指出,业务监督要有分寸。1967年2月,他严厉批评了某些组织的夺权行动,擅自让党委夺权的做法,激愤地说:没有叫你们监督党委的领导权,你们竟冒进没边了!不能叫党委夺权边站,革命不能革到无产阶级司令部,革到毛主席头上。并反复强调说:夺一撮走资派的权,有的地方不一定有,即使有,也是少数人,要看到十七年来还是毛主席的这条红线起主导作用。

又如在批林批孔问题上,1973年8月,江青曾在政治局会议上居心叵测地提出要毛泽东评述中国历史上儒法斗争的谈话内容写入十大政治报告,在全国立即学习贯彻。主持会议的周恩来表示“要理解消化一段时期”,不必马上公布。为了防止随后历史凶猛的批林批孔运动再度发展成“文化大革命”初期那种天下大乱的局面,1974年1月31日,周恩来抱病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军委系统、党政机关、生产部门应该严格遵守一些政策界限下达,军队的指挥作战、机要、通信、情报、供给等部门不搞“四大”;生产部门“在生产以外的时间搞”;当这一提议被江青集团以“会对群众的发动起框框”为由反对时,周恩来仍在叶剑英、邓小平等同志的支持下,坚持对军委系统不搞“四大”的问题做了布置,并在以后实际问题的掌握上,作了若干限制性规定。

二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重大关节点上,当历史的发展出现某些新的转机时,不时地机地促成了时局的转换,影响并推进了历史按正确轨道的进程。如一切事务变一样,“文化大革命”也是一种历史合力的结果。在这场历史悲剧中,尽管历史的必然要求受到历史要求的压抑和阻碍,但是它既然作为必然要求,就总要顽强地为自己开辟道路。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按照历史的必然要求,从另一个方面牵制了时局的演变,同时紧紧地把握住了历史出现的每一个转机,一步步地使党和国家从“文化大革命”的困境中摆脱出来。

如1967年7、8月间,由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操纵,整个局势出现了“文化大革命”发动以来最动乱的局面。在国内,武汉发生了“七·二〇事件”后,全国各地到处揪“军内一小撮”,冲击军事领导机关,抢夺军火武器装备,大规模的武斗流血事件急剧上升,各地纷纷告急。江青肯定了“文武攻武”的口号后,更是火上浇油,出现了“全面内战”的严重局面。在对外关系上,外交部被夺权,连续发生了“三碰一烧”的严重涉外事件,且有继续蔓延扩大之势。内政、外交都已失去控制,整个局势到了崩溃的边缘。在关系到党和国家安危存亡的关键时刻,周恩来当机立断,通过几级渠道,及时将时局的极端严重报告给正在外地的毛泽东,敦促他下决心采取断然措施,重新控制局势,结束这场动乱几乎不可收拾的局面。这成为“文化大革命”第一阶段中时局转换的枢纽。

再如,1971年9月发生的林彪叛国事件,是“文化大革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关节点。曾在“文化大革命”中红极一时的“副统帅”、载人党的“接班人”竟然在一夜之间之间逃叛国,落得个葬身异国荒凉的可能下场。这一惊心动魄的意外,无情地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理论和实践的失败,给人民以极大的震动。人民在思想中开始觉醒。在这种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的历史条件渐趋成熟的情况下,周恩来抓住这一历史的契机,毅然发表批判极左思潮这面旗帜,落实党的各项政策,平反部分冤假错案,解放干部、整顿和加强企业管理,恢复文教科技部门的正常工作,打开外交工作的新局面,尽可能地消除“文化大革命”给各个领域造成的恶果,大大推进了以往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斗争的深入程度,使得各方面的工作出现了转机。这一斗争,是在还不可能全面清算“文化大革命”错误的历史条件下所能进行的一种有限度的拨乱反正,构成了党和人民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左”倾错误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艰难曲折斗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又如,1975年,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害的“文化大革命”已经进入了第十个年头。在人民已经对“文化大革命”深感厌恶,强烈不满,迫切要求结束这场动乱的时刻,周恩来又一次地站在了历史的潮头。他在四届人大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重申了要“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这一“与‘文化大革命’主旋律格格不入的宏伟设想。它一扫当时压抑的政治气氛,点燃了人们心头的希望之火,使人民在黑暗中看到了祖国的光明前途,从而极大地振奋了人心,成为党和人民对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斗争的一个重大胜利。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周恩来在尽量减少“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损失的同时,也不得不说一些违心的话,做过一些违心的事。但人们可以理解,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不这样做,就难以起到前述两方面的重大历史作用。这是历史悲剧迫为了党和国家的最高利益,所能作出的一种恰当的选择。这是一场不得不付出代价的韧性的战斗。至于其中在我们整个国家处于历史的阴影之中而难免带有的历史的折光,是不过分苛求和指责的。正如胡耀邦同志指出的,在“文化大革命”中,他自己讲过,也说过一些违心的话,“但是我们全党同志都深深理解,在‘文化大革命’那种极端复杂的特殊条件下,周恩来同志为了保护党和人民,作了何等宝贵的贡献啊!”

(三)

人们在回顾“文化大革命”这段历史时,会很自然地产生这样一个问题: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周恩来能够在“文化大革命”这样极端复杂和险恶的情况下,始终坚守自己的岗位,力撑危局长达十年之久?这是一个十分复杂而又必须给以正确解释的问题。这里除了前述毛泽东的支持等因素外,不能不涉及到周恩来特有的斗争方式这一问题。

作为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和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政治家,周恩来从察觉“文化大革命”某些具体问题的反常现象开始,逐步意识到“文化大革命”的悲剧性、灾难性和持久性。当然,这只能是在当时历史条件所能允许的限度内。在他的战友、党和国家的其他领导人,由于种种原因先后被打倒或靠边站的情况下,尽可能地减少“文化大革命”这场动乱给党和国家造成危害的重任,历史地落到了周恩来的肩上。这是一场异常艰难而特殊的战斗。在这里,党的领袖的严重失误与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肆虐横行交织在一起;领袖在坚持“左”的错误路线方针的同时也曾制止纠正过某些具体错误;林彪、江青等人既是穷凶极恶的反革命集团,当时又在党内占据着合法的领导地位,如此等等,呈现着异常复杂的情况。因此,要想取得这场斗争的胜利,不能仅仅凭借勇气的蛮干。否则会出现刘少奇所说的那样“对此碰破头破血流”。只有从错综复杂的现实出发,使自己的斗争方式适应客观条件的可能和斗争的需要,“把对共产主义理想的无限忠诚同善于在实践中进行一切必要的妥协、机动、通融、迁回、退却等等的才干结合起来”(《列宁选集》第四卷二四八页),才有可能取得成功。

周恩来正是在“文化大革命”这样一种极其复杂的环境中,表现了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所具备的把坚定的斗争精神与灵活的策略高度结合起来的才能,显示了炉火纯青的斗争艺术。一方面,他如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评价的那样“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鞠躬尽瘁”,在党和国家遭受严重危险的时刻,挺身而出,奋起抗争,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另一方面,他顾全大局,讲究斗争策略,从斗争的实际效果出发,以清醒和理智的态度,牢牢掌握斗争的分寸和火候,尽可能地避免在党和国家已经遭受严重危险的时刻出现任何更加不利的局面。用一句形象的话来说,可以说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的惊涛骇浪中,如同一个饱经风霜、经验丰富的老船长,紧紧地把握着船舵,小心翼翼地躲避着险滩暗礁的各种漩涡和暗礁,坚定地驶向既定的目标——在尽可能减少损失、维持国家生活继续运转的同时,进一步地努力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等待着历史的转机 and 广大人民群众群众的普遍觉醒。周恩来自己就曾经过用一个形象的比喻来说明自己对待“文化大革命”的这种态度。他用大海涨潮时奔腾涌来的潮水来形容这场来势凶猛的“文化大革命”,说:潮水来了,总是有奔涌、被吞没、观潮三种情况。如果怕,就可能被潮水吞没下去;站在旁边,就是观潮。他引用鲁迅的话表明了自己的态度:要做勇敢的弄潮儿,站在潮头上,因势利导地迎接它。这正是抱着这样的一种信念,在“文化大革命”的狂风恶浪中,他正应付着各种错综复杂的情况。

在对待党的领袖的问题上,周恩来采取了分析的态度。对于毛泽东在当时的马何正确意见或曾在历史上提出过的正确思想,他总是坚决贯彻落实,并且尽可能加以发挥。收入《周恩来选集》下册的《一份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和《破除法西斯式的单线关系》就是其中有代表性的例子。又如,毛泽东在1966年10月中央工作会议提出“抓革命,促生产”的思想后,周恩来立即把它作为自己手中与林彪、江青一伙煽动“停产闹革命”进行斗争的有力武器,以至这一口号在广大群众的心目中已经成为“抓革命”的同义语了。再如,1972年1月,毛泽东亲自参加了陈毅的追悼会,在休息室里接见陈毅的夫人张茜时说,陈毅是个好人,是个好同志,要是林彪的阴谋搞成了,是要把这些人这些老人都搞掉的。并表示:邓小平的性质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在场的周恩来听了十分高兴,暗示陈毅的子女们想办法把这一思想宣传出去。这件事后来促成了小平同志的复出。

在对待毛泽东的“左”的错误思想上,周恩来总是根据自己的认识,在尽可能的限度内表明看法,提出建议;或是尽可能从积极的方面加以解释和引导。前者如1966年10月,毛泽东提出“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周恩来不同意这一提法。为此,他专门找了毛泽东,表明自己的看法,说党内历来提路线问题,都是说“左”倾右倾,并没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样的提法,这样提合适吗?当毛泽东仍坚持自己的看法后,周恩来保留了自己的意见,而在以后多次接见群众代表的讲话中反复强调“资反路线”错误,是认识问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这里应当指出,在当时的那种条件下,做到这一点是非常不容易的。徐冲在回顾“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时曾经说过这样的话:那时搞造反运动,批斗老干部非常激烈。不过,我们总不能向毛主席讲。在毛主席的威严之下,谁也没办法!后者如1966年八月十一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打倒司令部”后,一些红卫兵到处运用这一提法而“炮轰一切”,冲击各地的党政领导机关。针对这一问题,周恩来苦口婆心地做红卫兵的工作,反复强调这样的观点:“不能把打倒司令部认为是毛主席号召打所有的党政机关”,“不能乱打一通,不能对一切司令都都冲击”,“并不是所有的党政领导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如果那样看,把党中央放到哪里?这样看法,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不是落空了吗?”

在对待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问题上,由于他们当时分别担任党内重要职务,且反革命的本质尚未充分暴露,周恩来

在党内斗争的范围内对他们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

一是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尽量争取毛泽东的支持,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倒行逆施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周恩来特别注意这一点,而且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也只能这样。因此很多事情都是在毛泽东的支持或默许下做的。如在保护干部的问题上,一月夺权以后,各地区、各部门对干部的迫害愈演愈烈。针对这一情况,周恩来与李富春、陈毅、李先念、谭震林等同志紧急商量后,提出名单,报告毛泽东批准,让谭震林、王震、余秋里、谷牧、方毅、姚依林等二十多位国务委员各委的部长轮流住在中南海,并且把当时处境困难的宋任穷、李井泉、王任重、叶飞、江华、黄火青、王鹤寿等一些大书记和省委、市委书记接到北京,煞费苦心地安置在可靠的地方加以保护。对此,江青一伙大为恼火,在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上集体围攻周恩来,质问这些人的下落,指责这是不相信革命群众会搞文斗,打击了他们的革命情绪,保护了走资派。周恩来对他们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回击说:不管你们“文斗”也好,“小斗、小斗也好,我就是不允许。这比王明路线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还厉害,逼死了人谁负责?你们取保证吗?把他们坚决顶回去。”

二是把原则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巧妙地结合起来。如1967年夏,被钢武斗严重,造成许多高炉停产,生产急骤下降。周恩来十分焦急,决定派李富春亲赴鞍山解决问题。中央文革小组先是反对,后又提出由他们派一人同去。周恩来知道这样一来非把钢搞得更乱不可。于是,他采取取“指”的办法,说时机还不到,等几天再说。当江青等就这件事说他们不支持中央文革的工作,“不搞生产,不搞文化大革命”时,周恩来表示:不搞生产,不搞生产,人民吃什么用什么?靠什么搞革命?后来他与江青协商,派军队对叛钢派进行了军管。

三是坚持在重大原则问题上决不退让的前提下同时作若干必要的妥协和让步。如在四届人大的筹备过程中,针对江青、张春桥等人竭力要剥夺他们的亲信安插在教育、文化、体育部门的情况,周恩来与邓小平、李先念等几次研究,交换意见,认为教育部关系重大,以周梁鑫掌管为宜,文化、体育可作让步。在周恩来这种坚决而灵活的斗争下,取得了毛泽东的支持,挫败了江青反革命集团企图通过组阁夺取党和国家领导权的阴谋。

四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在自己的正确主张被批判后,采取迂回曲折的方式继续自己的努力。如,在1972年批极左思潮的问题上,周恩来从当时接待日本首相田中的繁冗的外事活动中,抽出时间数次与人谈两期后的一刊的国庆社论,提议将批判极左思潮的口号写入社论,以期推动全国批判极左思潮的深入开展。这一主张遭到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反对。当时在宣传工作的姚文元两次勾掉了这一内容。但周恩来并没有放弃自己的努力。社论后尽管未能写入批判极左思潮的字句,但针对林彪左思潮对各个领域造成的危害,从正面提出“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继续落实毛主席的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经济政策等无产阶级政策”,“要提倡又红又专,在无产阶级专政下,为革命学业务、文化和技术”,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五是日以沉默表示自己内心的抗争,在忍辱负重的磨难中,等待历史的转机。由于整个“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历史悲剧,党内政治生活极不正常,根本无法正常地发表意见。同时由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视为夺取党和国家领导权的最大障碍,必欲打倒而后快。而周恩来的进退一退,都关系到党和国家安危的重大问题,如果头头碰壁不冷静,言行稍有不慎,不仅于大局无补,而且会给正在一旁虎视眈眈的林彪、江青集团以打倒他的口实,从而给已经处于危难之中的党和国家造成更大的不幸。周恩来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因此,他除了一些在重大问题上与林、江集团进行面对面的斗争外,许多时候则是以沉默的方式表示自己无言的抗争。一般人都难以想象,在那些党和国家遭受危险的岁月中,周恩来每天度过的是这样一种怎样的日子。在凭借着自己特殊地位的王洪文、张春桥、林彪、江青一伙几次在极左会议上都对周恩来进行集体围攻,出难题,找岔子,罗织罪名,无限上纲,搞无休止的纠缠。这对周恩来来说不是一种极大的精神折磨。但是,周恩来为了党和国家的最高利益,忍辱负重,始终坚守岗位,顽强战斗,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苦苦的周旋,决不给他们以任何可乘之机。对于这一点,不仅许多一般的老同志不理解,甚至连有些与他并肩战斗了几十年的老战友一时也不完全理解。如谭震林曾在“二月抗争”中反击江青的一封来信中不解地表示:“总理,已被他们整得够呛了,总理胸襟宽,想得开,忍下这,等等候,等等到何?”对于同志的误解,周恩来不做任何解释,而是一如既往地向着自己认定的目标顽强地走下去。他坚信人民和历史最终会了解自己。当“二月抗争”不幸地夭折以后,正是周恩来不顾林彪、江青一伙指责自己是“不尊重流总后台”的困难处境,尽力保护这些受到错误批判的老同志。其中对陈毅的保护则更是人所共知、感人至深的例子。此外,当他得知谭震林在桂林期间不慎摔伤了骨头,便委托王南清加以照顾,帮他治好伤。从1972年12月毛泽东向谭震林的近后,周恩来立即写信给当时主管这一工作的负责人,说谭震林是老同志,“当时大雨倾盆仁堂是林彪故意造成打倒一大批老同志的局势所激成的”,“应该让他回来”。在他的督促下,谭震林不久便回到了北京。

疾风知劲草,板荡识忠臣。周恩来正是在党和国家遭受空前动乱的危难关头,与党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在与历史悲剧的抗争中,呕心沥血,殚尽全才,表现了共产党人和人民的耿耿忠心,使自己生命的最后历程放出了璀璨的光辉。他虽然没能亲手结束这场动乱,但是即以他自己的血肉之躯铺就了通向这一目标的曲折而坎坷的道路,为最终结束这场历史灾难奠定了基础。这一不可磨灭的功绩,深深地镌刻在历史的丰碑上。周恩来这个不朽的名字,永远为后人所铭记和敬仰。

(原载《文献和研究》1986年第一期,本报转载时,作者略有修改)

热烈祝贺南京手表厂钟山牌S N₂九钻男表荣获轻工业部优质产品证书

祝
贺
单
位

上海市百货公司
广州市百货公司
北京钟表眼镜公司
天津市百货公司
新疆钟表眼镜供应站
福建厦门百货站
安徽芜湖百货站
湖北武汉商场
宁夏百货公司
青海省百货公司
西藏商业厅

四川重庆钟表眼镜公司
四川成都百货站
云南昆明百货站
广西南宁百货站
河北石家庄百货站
河南省百货公司
河南洛阳百货站
辽宁沈阳钟表专业商店
江苏南京百货站
(排名不分先后)

鸣
谢

“钟山”牌SN₂九钻男表荣获轻工业部《优质产品证书》,是在上级领导、商业部门、兄弟单位、各界人士及广大用户的关怀、爱护、支持下获得的。借此机会向你们致以衷心的感谢,我们将戒骄戒躁,与新的时代合拍前进。愿为你们忠诚服务,为四化做出更大的贡献。

南京手表厂 厂长 彭本樵
及全体职工 拜上



雷公山下的一朵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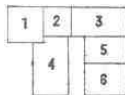
——记雷山县民族文化工作队

娃娃们来了，姑娘小伙子来了，老阿妈来了，芦笙吹响了……是什么喜事这样热闹？是县里的文艺队进山寨演出来啦！

贵州省雷山县地处雷公山区，苗家世代代生活在这深山之中。由于交通不便，人们要看个戏或电影可不容易，县里的民族文化工作队便应运而生。他们以乌兰牧骑为榜样，爬山涉水，走村串寨，送戏上门。他们的节目短小精悍，生动活泼，为苗家喜闻乐见。全队二十来个年轻人，多来自乡间，纯朴、勤奋，一人能做几样工作。同一个人，这个节目唱，下个节目就可能跳。他们不怕苦、不怕累，边远、穷困的地方也要去。他们的演出服装、道具，简单、轻便，挑起便走。尽管条件很差，在艺术上，他们是有追求的，演出从不马虎，因而出了人才。近几年有

三人分别考上中央音乐学院、中央民族学院和上海音乐学院。1983年，他们作为乌兰牧骑式的演出队，到北京演出，受到国家民委和文化部的表彰，获先进集体称号。

贺雅波 蒋 铎 摄影



- ① 老阿妈看得多高兴啊！
- ② 芦笙独奏。
- ③ 翩翩起舞。
- ④ 处处是舞台。
- ⑤ 演出结束后，演员们整理幕布和道具。
- ⑥ 他们给苗家带来欢乐，苗家把他们当成亲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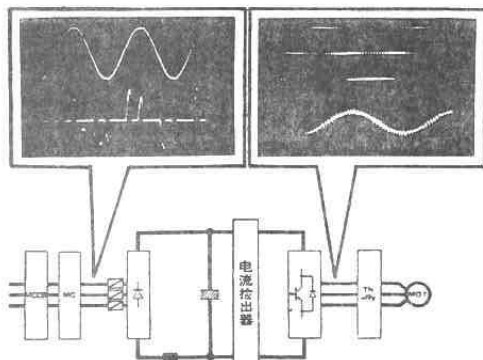


· 306 ·



电机调速的新技术 电控的新发展

大连电机厂引进了日本东芝的交流变频调速装置——大功率晶体管变换器的最新技术。可为您提供调速性能优良、节电效果显著、使用方便、运行可靠的变换器产品。该变换器可广泛用于化工、纺织、印染、钢铁、运输、机床、起重、食品、造纸、木材加工等工业领域，是交流电动机无级调速的理想装置。



- ☑ 单片微机控制的正弦波 PWM (脉宽调制)
- ☑ 大功率晶体管作为主元件
- ☑ 调速精度高、响应速度快
- ☑ 调速比可达 1 : 100 以上
- ☑ 良好的起动性能
- ☑ 完善的保护功能、丰富的外围设备
- ☑ 驱动风机、水泵可平均节电 30 ~ 40 % 以上
- ☑ 容量：1.5 ~ 200 KVA，适用电机功率：0.75 ~ 132 KW



大 连 电 机 厂

厂址：大连市南沙河口村 213 号
电话：41691 电报：7520
电传：86267 DEMW CN